

邓小平的故事之七

7

绘制改革开放 的蓝图

张繁玲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邓小平的故事》之七

绘制改革开放的蓝图

张 繁 玲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 北京

主 编
副主编
编 委

李和文
王立新
林枫叶
许海生
刘君立
梁林刚
陈 璞

魏 明
郝玉茹
李 晓 芬
张 繁 玲
夏 阳

汪秀川
谢 剑
傅文卿
曾又红

目 录

情系深圳特区	1
点燃上海腾飞的希望	15
对“荣老板”的支持和关怀	28
踏遍青山绘蓝图	37
华北军事大演习的总导演	53
百万裁军震寰宇	63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75
京城一市民	84
“特区姓‘社’不姓‘资’”	95
对首钢的谆谆叮嘱	107

情系深圳特区

在濒临香港的我国南海之滨，深圳河畔，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新兴城市——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首批经济特区中的代表，它以令世人惊叹的高速度在短短的几年内从一个荒芜的沙滩、破旧的小镇基础上拔地而起，建设成就举世瞩目，被誉为我国南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

作为我国经济特区的缔造者，邓小平对深圳特区寄予着厚望和深情；深圳特区，则以它那特有的风姿，向世人展示着邓小平的胆略、勇气和高瞻远瞩的睿智。

“划一块地方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前进的航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已成为10亿中国人民共同的行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之大鹏要腾飞，必须借助改革、开放这两

翼。

八亿农民掀起的改革大潮已开始涌动，“包产到户”不再是洪水猛兽。那么，中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1979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会议上，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会议期间，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这么大一座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

邓小平陷入了沉思。然后，他说出了一句应当载入史册的话：“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他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1979年6月6日、6月9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报告，确

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8月，全国人大召开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公开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还在1979年，就有一批勇于“吃蟹”的创业者，进驻那条不宽的深圳河的北面，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筹建特区。

1980年8月26日，那个如今被全世界当作热门话题谈论的南中国海边的小城，响起一片噼噼叭叭的爆竹声。在这片热闹的爆竹声中，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我要来看看”，邓小平踏上深圳特区这片热土

1984年1月24日，距农历春节还有七天。紫荆在特区的路旁已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庆的盆盆金桔摆上了特区人居室的阳台。在深圳特区诞生后的第五个春天的这个中午，邓小平迈着轻快稳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这片热土。

汽车驶向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路上，邓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几次轻轻地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

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

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下午，在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邓小平听取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

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站在特区规划示意图前，介绍着深圳特区自然状况，5年来引进外资、基建工程进展的情况。梁湘说，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1982年工业产值为3亿6千万元，1983年达到7亿2千万元。

“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邓小平问。

梁湘答：“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比4年前增长了10倍，去年达到3亿多。”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听完市委的汇报，邓小平乘车来到刚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在商场忙于采购年货的特区人发现了身穿深灰色便服的邓小平，喜出望外，热烈鼓掌欢迎。

邓小平登上20层高的国商大厦楼顶，俯瞰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他的面前，矗立着已经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在特区的规划图上，罗湖区将成为特区的商业金融中心。

邓小平的目光落在马路对面正在施工的国贸大厦。这座后来被誉为“神州第一楼”、高 53 层的现代化建筑，此时正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升腾。特区的建设者在国内率先采用大面积滑模的先进施工工艺，在这儿创立了蜚声中外的“深圳速度”。

天色已近黄昏，一抹晚霞映照着生机勃勃的特区。邓小平推开陪同人员送上的大衣，迎着阵阵北风，目光由近及远，久久注视着整个特区。

他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他对特区的建设发展速度表示满意。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 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25 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的渔民村访问。身穿崭新呢大衣的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激动地把客人引进自己别墅式的楼房里。这幢楼房上下两层，180 平方米，有 2 个客厅、6 间卧室，还有饭厅、厨房、卫生间，楼上楼下的客厅里各摆一台彩电和收录机。

邓小平问吴伯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伯森说：“都有了。做梦也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他再三感谢党的富民政策。

吴伯森将客人引到一口池塘边，指着一排养鸭的

水上茅棚说：“这是60年代以前群众住过的房子，现在都给鸭子住了。”他介绍道：去年全村年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2800元，每个劳动力年收入5970元，劳动力月均收入439元。

这时，陪同人员对邓小平说：“比您的工资还高呢。”邓小平略一沉吟，说：“全国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100年。”他又说，像深圳发展得这样快，也得要50年。

25日下午，邓小平参观了上埗工业区深圳中航技术进出口公司。当邓小平走进这家电子厂的防尘、恒温的车间时，车间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计算机屏幕上打出“振兴中华，勤奋工作，向四化进军”的字幕，表达他们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衷心感激。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人和计算机下象棋的表演。在听取该厂关于搞电脑软件开发、发展智力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发展情况汇报后，邓小平高兴地说：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重视培训青少年。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

26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濒临深圳湾的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他看了工业区全景的模型后，指着窗外蛇口港码头问工业区领导袁庚：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一一作了回答。

袁庚特别提到，办特区以前，蛇口是人口外流外逃的口子，办了特区以后，不但人员不外流了，相反，现在是人才回流、资金回流。几年来由客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47家企业，其中30家已投产，10家开始盈利。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袁庚说，蛇口改革了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招聘和合同制，实行职务工资和浮动工资。几年来的实践，我们体会最深的是：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要同工资制度的改革同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要同步进行。听罢，邓小平微笑颌首。

在蛇口工业区，邓小平首先视察了微波通讯站，而后到合资经营的华益铝材厂和海上旅游中心参观。邓小平为我国首座海上旅游中心挥笔写下了“海上世界”4个字。

几天的实地考察，邓小平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有了更直接的感触。离开深圳到达广州，他欣然提笔，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特区是个窗口”，“在深圳那里
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搞”**

1984年2月中旬，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珠海、厦门三特区的视察，返回北京。

2月25日，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进行了谈话。

邓小平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其中蛇口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

他还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说明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说着，邓小平的神色严肃起来，“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

他缓了口气，话题又落到深圳特区上来，“在深圳那里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搞，一个是建核电站，一个是吸引华侨投资办所大学。华侨在那里办大学，由他们聘请国外水平高的教授，从国外购买教学设备，这样

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

1984年，深圳尚处于初创、起步阶段。一些人对它怀疑，有人非议。各种困难和阻力，挡在深圳刚刚抬起的脚步前。

但深圳和深圳人是幸运的。邓小平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深圳予以最强有力的支持。深圳不再为各种议论的纷扰而忐忑不安。

“深圳经济特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试验”

1985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隔着摆放茶杯的茶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与邓小平分坐在宾、主席上。作为老朋友，会谈的气氛是亲切融洽的。

10年前，钱伯斯访问中国时，曾见过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10年后再次来访，钱伯斯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中国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大变化；二是81岁高龄的邓小平，竟如此身体硬朗、精神饱满。他对这两点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钱伯斯毫不掩饰对邓小平的身体健康的羡慕，问邓小平：“我想请教一下，您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什么？”

邓小平笑了，说：“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4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他说：

“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钱伯斯说：“10年前我曾访问过中国，这次我们看到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

邓小平说：变化是有的，但还是小变化。10年或15年以后，我们的变化可能会更显著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我们的开放政策、其他一系列经济政策以及全面的体制改革都是一种试验。邓小平强调：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变化。变就意味着没有出路。我相信我们的政策是会成功的。

钱伯斯认真地听着。他对邓小平说：“你对自己的政策保持如此的信念，使我十分钦佩。”他告诉邓小平，他将前往深圳特区参观。

邓小平说，深圳经济特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经验。现在看来，我们原来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又说，你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发展是很快的，但这毕竟是一个试验。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不过，特区开始才3年多一些时间，再过3年总会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情况了如指掌。就如他当年

运筹帷幄、指挥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熟悉战区内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村庄，熟悉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攻守态势。在肯定深圳特区建设成就的同时，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透析着深圳异乎寻常的发展速度背后隐藏着的问题。他在提醒深圳，在鼓励深圳开拓新路子。

正如邓小平所预料的，1985年的深圳，在几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过热、效益偏低等问题似退潮后的礁石，显露出来。

适逢全国进行信贷、基建压缩，深圳的一些建设项目因资金拮据不得不中途刹车。一些外商以为中国特区政策要变，相继抽回投资。深圳的双肩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深圳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作为承担4个经济特区的重任，探索中国开放之路的排头兵，深圳没有回避深圳发展中的痛苦，新的艰辛尝试。深圳的目光开始越过南中国海，越过太平洋，投向国际市场。深圳决定：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1985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避暑胜地北戴河，清凉的海风驱走了酷热。

在一幢外表朴素、绿荫掩映的建筑里，邓小平会见了竹入义胜及其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13次访华代表团。会谈长达70分钟，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经济特

区问题。

邓小平说：“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怀疑，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的判断，建立经济特区的话是不是改变了。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竹入义胜说：“你的话非常明确，全世界的人听了以后都会放心的。”

更放心的是深圳。它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方向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深圳人振奋了，他们有了向新的目标奋进的信心和力量。

“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时间进入 1987 年 6 月 12 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摄影灯频频闪烁

的光，充盈着会见厅。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两国的建设经验感到高兴。

邓小平向客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

邓小平再次提到 1984 年的深圳之行，并为他在深圳的题词的深刻内涵作了最准确的注释：“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当时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很大的成绩。”

他接着说：“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这样就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 50% 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现在我可以放